



攝於 2019 年 8 月 15 日，灑金桥北口的牌坊。

不只是戀家： 西安回坊青年的「第三種」未來想像

馬振瀚 |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生

我們還是比較戀家一點

在田野的某天晚上，筆者在回坊的領路人小馬拉著我和他的表弟鹿堯，一起把為了結婚準備的新家電，搬到坊上西側正在裝潢的新婚房。他騎著三輪車載著我們和家電，來回穿越在坊上狹窄又充滿遊客的街道間。小馬就如許多正值適婚年齡的回坊青年一樣，普遍會將新婚房安在坊內。有的可能是買房，有的可能是將自家房子再向上加蓋幾層。但不論如何這樣的現象在回坊一直相當地常見。

回坊位於西安市市中心西北角，是一個古老的回族聚居區。由於其不同於周邊以「漢族」文化為主的異質性社會型態，同時又具有少數民族聚居區罕見能置身在市中心的特殊地理位置，因而形塑出回坊不論在城市空間或文化邊界上，皆呈現相對封閉且具有明確內外邊界的區域。回坊在九零年代左右，因為政府出資將其打造成西安市著名的觀光仿古商業街區。觀光人潮的湧入，雖說

帶來了錢潮，但也使得街巷全天候為外地遊客所填滿，並導致坊內多項公共設施皆嚴重超載。然而像是小馬這樣的回坊青年，為何最終仍選擇住在回坊，而不是選擇到西安其他區域，甚至是到「北上廣深」等沿海大城市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？特別是他們這些年齡約在而立上下的回坊青年，其原生家庭許多都是有能力供應他們在西安市更好的區域，購置新屋當作新婚房，而無需繼續住在回坊這個與四周環境相比，皆顯得古老與落後的區域。關於這個提問的答案，筆者最初僅從鹿堯口中得到「我們還是比較戀家一點」的解釋。

我們是誰？

小馬在帶領筆者進入回坊與認識回坊的過程中，介紹了一群與他同樣是從小由回坊孕育茁壯的回坊青年。筆者認識他們的時候，他們正巧都處於轉換人生階段的過程。

有的人正計畫著結婚，有的甚至已迎來家裡的第一個孩子；也有人正籌備著創業或決定繼續升學。這群普遍接受過大學以上高等教育，甚至擁有國外大學學歷的回坊青年，在當代中國的脈絡下，應當是一群極具「發展前景」的社會新血。然而，筆者卻發現他們在完成學業後，有的人或許曾在沿海大城市中短暫打拼過一陣子，但最終都如小馬一樣，選擇放下可能更好的發展機會或薪資，回到回坊生活。這群回坊青年在做出此種看似逆勢而為的決定時，究竟在腦海中描繪著何種對未來的想像？

這群回坊青年在人生階段轉換的路口所做出的抉擇，實際上與回坊在九零年代之後的發展，以及他們對自身文化認同的覺醒有著密切關聯。回坊在改革開放後不久，即被政府主導改造成西安市的著名觀光景點。坊內回族的清真餐飲、民族服飾與信仰習俗，這些特殊且相對陌生的「少數民

族文化」皆成為回坊得以成功商業化與觀光化的重要資本。就如 Gillette (2000) 在其民族誌研究中所描繪的，回坊在九零年代之後快速的觀光化與商業化，為坊民帶來了大量的資本積累；而坊民基於資本積累的消費行動，更成為他們得以對抗國家現代化意識形態加諸在其身上，諸如封建、落後與不文明等形象的工具。這群回坊青年的父母正巧就在這段回坊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受益，並為他們的下一代提供了更好的物質生活條件與受教育的機會。

Gillette (2000) 在描繪坊內回族居民於九零年代，藉由消費行為與提升物質生活條件，來抗衡或再詮釋國家現代化意識型態的日常實踐，並未料想到這些坊民的下一代在踏出回坊之後，卻會在自我身份與文化認同的層面上，遭遇到意想不到衝擊。就如小馬所說：「我從來都沒感覺到自己是少數民族，直到我離開回坊到外面去上



攝於 2019 年 12 月 4 日，回坊西側的觀光街區。



攝於 2019 年 12 月 5 日，回坊東側灑金桥的日常街景。

學」。當這群從小在坊上長大的青年踏出回坊到外地求學，許多原本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變得相當不便。像是堅持只吃清真的食物、拒絕喝酒，或是更進一步的齋戒與每日五番拜。這些原本是其日常生活一環的信仰實踐，頓時讓他們成為，在以漢族為多數的同學間，異樣目光的焦點，或是為其帶來相處上的尷尬處境。鹿堯說他

在浙江讀大學時，某次碰巧遇到一個同為回族的同學從非清真的學生食堂走出來。他說他當下想到對方可能吃了非清真的食物，甚至可能吃了豬肉的畫面讓他覺得特別噁心。但不論是小馬或鹿堯，他們也都坦白說，許多回族人在外地為了融入到以「漢族」為主流的社會中，而選擇在信仰上妥協的現象其實十分常見。

上述的掙扎打從這些回坊青年踏出回坊求學開始，便一直跟著他們並延續到其進入職場。這實際上也呈現出，回族猶如多數中國少數民族一般，都同樣被迫要面對，在快速現代化的過程中，自身民族與文化的消逝。並在當代以「漢族」文化為主流的中國社會情境中，對自我的身份認同做

出抉擇。就如小馬在某次聊天對筆者的提問：「回族之所以是回族，如果把伊斯蘭教的元素剝離開來，你說他還剩什麼？」。實際上小馬同時也在反問自己，究竟自己是誰？回族與穆斯林能畫上等號嗎？

選擇未來

回族等同於穆斯林嗎？這個問題在當代中國回族研究與相關領域中，基本上已明顯劃分成建構論與本質論，兩派涇渭分明的論述體系（Gladney 1991；余振貴 1991；張中復 2005）。然而這對小馬、鹿堯，或其它有著類似經驗與焦慮的回坊青年來說，這不是個形而上或理論性的問題。這個問題不僅十分具體且真實地存在在他們的生命之中。當這群回坊青年離開了回坊，踏入了快速發展與劇烈變化的坊外社會。他們才逐漸意識到原來自己是少數民族，並經

歷著各種疑惑與自我懷疑。從小習以為常，對於伊斯蘭信仰的諸多實踐，原本是他們在坊外界定與標示自己是誰的重要根基；但是卻也搖身一變，成為他們融入主流社會，與成為國家現代意識形態下文明人的阻礙。而過去嘗試探索與找尋解答的小馬，他如此回答自己的提問，他說：



攝於 2019 年 12 月 5 日、灑金橋街上各家取水的水龍頭

回族最核心的東西就是伊斯蘭教。你可以說他不光是伊斯蘭教，你不能把伊斯蘭教給回族的文化劃等號；但是他是一

個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就如果你把伊斯蘭教這個部分剝離開之後說「我是一個回族，但我不是穆斯林」，那請問你是什麼？

在這群包含了小馬與鹿堯的回坊青年中，他們最後選擇回到西安工作、回到回坊居住。這個決定不單單只是鹿堯說的「戀家」那麼簡單。回坊作為一個真實存在的物理性空間，以及一種對家的意象投射。它確實成為這群回坊青年，在經歷外部社會種種衝擊之後，得以暫獲喘息的地方；但另一方面，它更成為了承載著回坊青年對認同的選擇與未來想像。回坊為什麼存續？就猶如鹿堯所說，是「政府基於對回族文化的認可，而不是對伊斯蘭文化的認同」。九零年代至今的資本積累，不僅成為坊民與國家、與現代化意識形態談判與協商的工具，那更是他們與地方政府利益交換的籌碼。回坊因此成為了一個具有屏障，且

猶如洋蔥般的空間或場域。這些青年選擇回到回坊，因而不需要再因為自身少數民族的身份，被迫夾在現代與落後之間掙扎與抉擇。他們也無需再為了更好地融入主流的漢文化社會，而妥協自己的信仰，造成自己處於自我懷疑的模糊境地。他們在回坊的空間中，得以重新拾起在坊外受到衝擊，甚至破碎的自我認同；另一方面，這個選擇也是他們決定要重新擁抱，對其生命成長過程有著極為重要，且影響深刻的伊斯蘭信仰。他們有意識地運用回坊的空間性存續與壟斷地租（Monopoly）作為最外層，以回族的法定少數民族身份作為中層，隱晦地保護著與實踐著位在最內層，也是最核心的信仰認同。並同時希望透過他們這一代人的實踐與堅守，能將其繼續傳承給下一代的回坊青年。

參考書目

Harvey, David

2002, *The art of rent: globalization, monopol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*. *Socialist Register* 38: 93-110.

Gladney, Dru C.

1991, *Muslim Chinese: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's Republic*. Cambridge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.

Gillette, Maris B.

2000, *Between Mecca and Beijing: modernization and consumption among urban Chinese Muslims*. 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.

余振貴

1991, 〈新時期中國回族研究巡禮〉。《回族研究》1: 18-29。

張中復

2005, 〈華夷兼蓄下的邊緣游移：論當代中國回族民族屬性中的少數民族化問題〉。《政大民族學報》24: 115-147。